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叶远飘◎著



芫野东南的民族丛书

何国强 主编

青藏高原东部的 丧葬制度研究

中山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叶远飘◎著



羌野东南的民族丛书

何国强 主编

青藏高原东部的丧葬制度研究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藏高原东部的丧葬制度研究/叶远飘著.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3. 12

(芄野东南的民族丛书/何国强主编)

ISBN 978 - 7 - 306 - 04699 - 4

I. ①青… II. ①叶… III. ①青藏高原—葬俗—研究 IV. ①K89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16488 号



出版人: 徐 劲

策划编辑: 嵇春霞 周建华

责任编辑: 嵇春霞

封面设计: 林绵华 曹巩华

责任校对: 廖泽恩

责任技编: 何雅涛

出版发行: 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 编辑部 020 - 84111996,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发行部 020 - 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 510275 传 真: 020 - 84036565

网 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 广州中大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787mm × 1092mm 1/16 18.25 印张 347 千字

版次印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2000 册 定 价: 46.00 元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总 序

黄淑婷

青藏高原古称“羌野”^①，“喜马拉雅”与“横断”两条山脉在东南交汇，形成北半球地表褶皱最明显而紧密的区域——纵横千里，层峦叠嶂，忽而峡谷幽深、激流汹涌，忽而悬崖突兀、雪峰傲立。雄奇的景观掩饰着严酷的自然。适宜耕种的土地集中在河谷，陡峭的高坡土层稀疏、岩石裸露、杂草丛生，经常发生泥石流。山川、植被、动物、村庄依季节交替呈现出各种姿态：旱季，尘土飞扬、风霜严寒、万物萧条；雨季，四野青翠、鸟语花香、人畜徜徉于云端。

羌野东南素有“民族摇篮”之称。在北纬25°~38°、东经90°~104°的广袤区域，由东至西，有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独龙江和雅鲁藏布江，史前时代的汉羌之争，造成部分羌人融为汉族，部分羌人西迁。^②西迁的羌人一部分沿着江河古道北上甘青，另一部分南下川滇，到达今川、滇、藏交界区，更有一些部落进入了东南亚。他们南北行走的整套路线分布的区域到公元前4世纪业已形成民族走廊。《史记》记载了张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汗）见到四川特产的见闻^③，那是公元前2世纪发生的事情。又过了两个世纪，最后一批迁徙者

① 《诗经·小雅·小明》曰：“明明上天，照临下土。我征徂西，至于羌野。二月初吉，载离寒暑。心之忧矣，其毒大苦！……”大意为周天子令诸侯征伐氐羌系部落，西行到青藏高原，将士思乡，无心恋战，企图班师回朝的情景。《说文解字》解“羌”，一为“远荒”；一为草本植物，如“秦羌”——兰花形，生长于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接壤地带、海拔3000米的荒野，愈向西愈密。故“羌野”指今青藏高原东部，即今川、青、滇、藏四个省（自治区）相交的区域。

② 如（南北朝）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第七十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52~253册）有“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獯戎。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的记载，说战国初期（公元前475年）以“昂”为首的一支羌人迫于族群竞争的压力，由今甘陕地区向西南徙迁至玉树地区。

③ 汉朝的四川特产远播大夏绝不可能走西域丝绸之路，那样将徒增路程，最有可能的是走西南丝绸之路，起点为成都，终点为印度甚至波斯（今伊朗），中间点为夜郎（今贵州）、滇（今昆明）、南诏（今大理）、缅甸。这说明中西交通很早就贯通了。

沿着民族走廊进入东南亚。东晋、十六国时期（317—420年），鲜卑族从大兴安岭西迁，抵达青海湖与当地羌人杂处，出现西羌、吐谷浑、白兰、党项、附国、吐蕃、姜人等古代部族，也有南迁的情况出现。各氏族部落在南迁路中定居、联姻、繁衍，发生贸易、战争和宗教行为，经过千百年的基因采借与文化交汇，演变出藏族、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傈僳族、怒族、独龙族、景颇（克钦）族、克伦族、骠族、缅族、掸族等境内外民族。^①元明以降，封建国家的势力先后侵及这片土地。目前，一块归中国，一块归印度，一块归缅甸。《艮野东南的民族丛书》就揭示了中国西南川、滇、藏和川、青、藏接壤地带极具内涵的民族文化。这些民族是藏族、纳西族、怒族、独龙族和傈僳族。这些民族人们的体质特征与三支种群有关：①蒙古北亚人，特征是高身材、中头型、高鼻型、前额平坦、黑眼珠，男人高大英俊，女人身材颀长；②蒙古南亚人，特征是身材略矮、低头型、前额微窄、褐色眼珠、低鼻型；③“藏彝走廊”型，介于前两者之间，又自成一类，其特征是中身材、中头型、中鼻型，孩子的眼珠较黑，成人的眼珠泛褐。具体来说，怒族和独龙族人带有蒙古南亚人的体质特征，藏族、纳西族和傈僳族人带有“藏彝走廊”型的体质特征。由于藏族人的来源复杂，内部族群众多，有的体质特征偏向蒙古北亚人。例如，三岩藏族人的体质特征与塔吉克族、维吾尔族、锡伯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北方民族关系密切些，跟藏彝类型的藏族关系疏远些。^②无论体质特征如何，这5个民族的人民都有率真淳厚、健谈好客、谦让刚毅、吃苦耐劳的一面。人们因地制宜谋取生活资料，建造房屋，修建梯田，引水渡槽，高山放牧；人们也抽烟喝酒、唱歌跳舞，知足常乐。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组织集中进行民族识别（1953—1956年）和少数民族语言与社会历史调查（1956—1958年）。根据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的描述，当时藏族、纳西族、怒族、独龙族和傈僳族等民族已出现社会分化：有的社会结构呈尖锥形，如藏族的农奴制、纳西族的土司制；有的社会结构呈钝锥形，如保留着原始公社残余的怒族和独龙族。民族文化的保持与传承是通过社会结构来实现的。独龙江两岸的村落出现了头人、大小巫师（南木萨、龙萨）、工匠、平民、家奴。前三种人基本上是富裕的族人，他们拥有土地，蓄养奴隶，并未完全脱离劳动。奴隶来自债务和买卖，成为家庭的一员，由主人安排婚姻，给予经济开支。奴隶在公共场合（如祭礼、

^① 参见（五代）刘昫《旧唐书》卷197列传第14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68～27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和（宋）欧阳修《新唐书》卷222上列传第147上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72～276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关于南蛮、西南蛮和骠国的描述。

^② 参见何国强、杨晓芹、王天玉等《三岩藏族的体质特征研究》，载《人类学学报》2009年第4期，第408～417页。

公议、公断等)与平民有身份界限。劳动过程中主仆地位不同,主人为奴隶提供生产资料(如土地、牲畜、农具、种子),并占有全部收获物。人们在社会结构中各居其位,各层次的差别不大,在血缘、地缘基础上发生的共济、共庆、换工等集体行为维持着内部平等,原始宗教和基督教起到恐吓叛逆者、安抚民众、制止反抗的作用。旧的社会结构被打碎以后,新的社会结构逐步建立,其所传承的文化与过去有着质的不同。

17世纪,西方人陆续进入喜马拉雅东部山区与横断山脉南部的多条河谷。早期的传教士、探险家带着猎奇的眼光看待这里的风土人情。19世纪伊始,民族学家、地理学家、行政人员、桥梁工程师开始进入这片地域上无人知晓、地图上一片空白的沃野。到20世纪40年代末的150年间,他们记录了大量宝贵的材料。英国、美国、印度三国学者的成绩尤为突出,如果只见他们为殖民政府服务的一面而不见其科学记述的一面是不公平的。在此,我愿意借鉴沙钦·罗伊的书单^①,肯定J. 马肯齐、J. 布特勒、G. W. 贝雷斯福德、A. F. 查特尔、P. C. 巴利、B. C. 戈海尔、M. D. 普格^②等人的工作;我还要提到F. M. 贝利、F. K. 沃德、维雷尔·埃尔温、P. N. S. 古塔、马骏达、N. 罗伊、B. C. 古哈和S. 罗伊等人的努力,特别是约瑟夫·洛克、克里斯托夫·冯·菲尤勒-海门道夫和埃得蒙·利奇的奉献。

洛克于1922年到达中国西南边陲,在川、青、甘、滇接壤地带考察,为美国农业部、国家地理协会和哈佛大学收集植物和飞禽标本,在丽江度过了27年。随着时间的推移,洛克的研究兴趣转移到纳西族的文化上。他的《纳西英语百科词典》收入了东巴教及濒于消亡的古纳西语,他撰写的《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叙述了当时甘青交界处、滇西北、川西南和西藏纳西族居住区域的地理、历史、物产和文化。1992年,迈克尔·阿里斯在纽约出版了《喇嘛、土司和强盗》,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回顾了洛克在川、滇、藏的田野研究经历。^③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利奇在克钦山区打游击。那个地区为中国的滇、藏和印度的阿萨姆邦三面环绕,有号称“野人山”的莽莽丛林。利奇广泛地接

^① 参见(印)沙钦·罗伊《珞巴族阿迪人的文化》,李坚尚、丛晓明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7~302页。

^② 他们的代表作分别为《孟加拉东北极边地区山区部落记事》(1836年版)、《阿萨姆山区部落概述》(1847年伦敦版)、《阿萨姆东北边境记》(1881年西隆版、1906年重印)、《阿波尔的吊桥》(载《皇家工程师》1912年第16卷)、《阿萨姆山区部落的头饰》(载《皇家孟加拉亚细亚学会会刊》1929年总字第25卷)、《阿波尔人的农业组织》(载《人类学系调查报告》1954年第3卷第2册)、《东北边境特区的娱乐活动》(1958年版)等,这里仅仅提到很少的一部分。

^③ 参见Michael Aris et al. *Lamas, Princes, and Brigands: Joseph Rock's Photographs of the Tibetan Borderlands of China*. China House Gallery,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92.

触克钦人，于1954年出版《上缅甸诸政治体系》，提出社会转变的动力学模型。几乎在同一时期，克里斯托夫·冯·菲尤勒-海门道夫在印度调查了10年，期间以特派员的身份在阿萨姆地区工作两年。他和妻子贝蒂·勃纳多在调查阿帕塔尼人^①的间隙中，专程到麦克马洪线以南的斯皮峡谷，那里距离西藏的瓦弄咫尺之遥。因物资供应不足，1944年4月2日夫妇俩开始撤退，准备翌年再进行调查，后因印度政府决定推迟这项计划，最终未能进入西藏察隅地区。海门道夫基于田野调查的12本书^②对于青藏高原的研究极具参考价值。

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民族学家，无论是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还是中国人，都是在利用前人收集的原始资料、绘制的地图、提炼的概念、阐述的命题和他们的民族识别、文化分类的成果，并汲取他们务实与求真的精神力量。

中国学者对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民族调查可追溯到抗日战争时期，左仁极、羊泽、朱刚夫、李式金、李中定、陶云逵、黄举安（以姓氏笔画为序）等人曾赴三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并流地区，调查成果虽然一鳞半爪，但科学精神不可低估。李霖灿、方国瑜、杨仲鸿对纳西语的研究尤其值得一提。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我的同仁，如王辅仁、王晓义、孙宏开、刘龙初、刘芳贤、宋恩常、宋兆麟、吴从众、李坚尚、杨毓襄、张江华、姚兆麟、龚佩华、谭克让、蔡家骥、欧阳觉亚（以姓氏笔画为序）等，跋涉于川、青、滇、藏交界区的山水之间，也提出批判地学习和吸收西方人类学的任务。^③1979年，西藏社会科学院资料情报研究所在北京成立，后迁至拉萨，组织翻译了一批文献，吴泽霖、费孝通都身体力行地做过译介工作。^④由于各种原因，我们的研究起步较晚，田野研究缺乏长期性、系统性，理论方法上也有故步自封的表现，偏重于社会经济形态的素材，而较容易忽视社会组织、风俗制度与意识形态的素材。

① 中国民族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阿帕塔尼人与珞巴族人同源，阿帕塔尼是珞巴族的组成部分。珞巴族包含20多个部落，如尼升、巴依、玛雅、纳、崩尼等，其经济形态与独龙族完全相同。

② 它们是《赤裸的那加人：阿萨姆邦的猎头部落的战争与和平》（1939年第1版、1968年第2版、1976年第3版）、《苏班西尼地区的民族学注释》（1947年版）、《喜马拉雅山区未开化的民族》（1955年版）、《阿帕塔尼人和他们的邻族：喜马拉雅山东部的一个原始社会》（1962年版，有中译本）、《尼泊尔的夏尔巴人：信佛的高地居民》（1964年版）、《尼泊尔、印度和锡兰的社会等级制度和血缘关系：对印度教与佛教相接触地区的人类学研究》（1966年版）、《尼泊尔人类学述略》（1974年版）、《喜马拉雅山区的贸易者：尼泊尔高地的生活》（1975年版，前三章半有中译本）、《喜马拉雅山地部落：从牲畜交换到现金交易》（1980年版）、《阿鲁纳恰尔邦的山地人》（1982年版）、《西藏文明的复兴》（1990年版）和《在印度部落中生活：一位人类学家的自传》（1990年版中译本）。

③ 参见林耀华《序》，见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④ 参见《费孝通译文集·前言》（上册），群言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强调“补课”，出版了不少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著述，这是可喜可贺的。最近十几年，获得高级职称的中青年学者也越来越多。但是，不可否认，一些民族学工作者欠缺实地调查的经历，学界对田野调查的要求放松，对边陲少数民族的研究远远不够，市面上田野研究的著述稀少。有人说，目前田野工作的条件（如交通、通讯、住宿、饮食、医疗、安全、语言沟通、调查工具和手段等）较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知改善了多少，可如今的实地调查与书斋研究的比例较之于过去不知减少了多少。^①本人深有同感。我虽然退休多年，但也知道一点外面的情况。现在科研的资助力度每年都在增大，下达的课题也在增多，出版界欣欣向荣，民族类的期刊、书籍相当多；但是，深入扎实的调查研究没有跟上来。由于辛勤收集第一手资料和认真提炼、精巧构思并以朴实平正的笔调叙述的作品不太为社会所赏识和鼓励，因此田野作品越来越少。这种情况与历史的发展很不合拍。就青藏高原东南部而言，随着旅游的开发，三江并流自然景观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社会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意识被带动起来了，国内外迫切需要了解这一区域的民族现状，抢救、整理和保存当地的原生态文化迫在眉睫。但经常到农牧区做调查的人不多。原因何在？这恐怕与投入和产出的衡量标准有关。譬如，有些环境陌生而艰苦，原创性作品生产周期长，即使出得来，社会反应也需要一定时间，不如“跟风”成效快。“不可否认，学界急功近利的浮躁之风，评判成果室内室外一刀切的做法，都是使田野调查边缘化的原因。”^②我认为，端正调查之风、调整激励机制势在必行，否则民族学研究将难以为继，更谈不上以良好的姿态服务于社会。

西北川、青、藏交界区，以及西南边陲川、滇、藏接壤地区，民族学资源异常丰富，吸引着以何国强教授为首的研究团队不畏艰苦、锲而不舍地调研。这套由7部专著组成的丛书即有选择性地介绍了那里的民族文化。分册和作者名依次为《青藏高原的婚姻和土地：引入兄弟共妻制的分析》（坚赞才旦、许韶明）、《碧罗雪山两麓人民的生计模式》（李何春、李亚锋）、《整体稀缺与文化适应：三岩的帕措、红教和民俗》（许韶明、坚赞才旦）、《独龙江文化史纲：傣人及其邻族的社会变迁研究》（张劲夫、罗波）、《青藏高原东部的丧葬制度研究》（叶远飘）、《妇女何在？三江并流诸峡谷区的性别政治》（王天玉）、《滇藏澜沧江谷地的教派冲突》（王晓、高薇茗、魏乐平）。翻开细细品

^① 参见郝时远主编《田野调查实录：民族调查回忆·前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

^② 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编订：《人类学的询问与记录·序言》，周云水、许韶明、谭青松等译，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13~14页。

味，看得出作者们长期研究的积累。主编何国强教授是我的学生，也是这个研究团队的组织者。他17年来坚持探索汉藏区域文化，主张多学科相结合，调查素材、史志和理论三点互补，中外资料融会贯通，以及汉族区域和少数民族区域的文化现象互为衬托的研究思路。自1996年夏天至今，他已11次踏上青藏高原。担任博士生导师以后，他努力寻求基金会的支持^①，推动每一届研究生到青藏高原东部和东南部选题作论文，秉承老一辈民族学家研究西南民族的传统，深入偏远的高山峡谷。据我所知，另外10位中青年作者在跟随他学习期间，除极少数人之外，皆有1年左右的调查经历，目前分别在高校或科研部门工作。他们的成果与书斋式的研究不同，每一本书都充满鲜活的材料，讲理论、重实际，穿插纵横（时空）比较和跨文化研究（类型）比较，散发着田野的芬芳。

调查员根据已有的知识草拟提纲，到当地观察、询问和感受，苦学语言，一丝不苟地记录，孜孜不倦地追寻文化变迁的足迹，修正调查提纲和理论预设。他们入乡随俗、遵循当地礼节，与村民建立互信，由此获得可信的感知材料。但这套丛书不是田野材料的机械堆砌，而是在科学方法和理论模块引导下的分析、综合与描述，不仅揭示了该地区存在的一些问题——如风俗制度的动力和机制、传统生计的命运、社会转型时期妇女的角色变迁等——而且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切合实际的解答。

这套丛书坚持了民族学研究偏远之地的优良传统，同时强调多维视角，突出科研的前沿性、创新性及应用性，对于边疆少数民族的研究具有弥足珍贵的作用，同时给东南亚乃至世界的民族学提供了参考价值；在抢救和整理濒临绝境的原生态文化方面，体现了学术研究在增进国民福祉及促进社会和谐过程中的作用，在为西部开发提供决策依据并带动民族文化的保护性研究等方面均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这套丛书还凸显了“好料做好菜”的诀窍。前期4个课题资助，10余年田野调查取得的第一手资料绝不会自动转化为社会公认的产品，需要紧扣“民族特色”提炼选题，科学搭配，形成整体效应。编者先是将婚姻与丧葬制度、血缘组织、传统生计、本地宗教和外来宗教（东巴教、藏传佛教和天主教）的碰撞、妇女地位、先进民族的帮助与后进民族的发展等选题集合在一个总题目下共同反映特定区域的文化，“好菜”就做了一半；继而在中山大学

^① 本研究相关课题获得4次资助，即“青藏高原的兄弟共妻制研究：以卫藏和康的五个社区为例”（香港中山大学高等学术研究基金，2004—2005年）、“青藏高原东部三江并流地区民族文化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2006—2008年）、“三江并流峡谷的民族文化和结构变迁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07—2009年）、“川青滇藏交界区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动力学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2—2014年）。

出版社的鼎力协助下申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争取新的资源来整合后续工作。这样，整道“菜”就做好了。以上两点在何国强教授与中山大学出版社的通力合作中可见端倪，同时专家的支持^①也相当重要。在这个基础上，各分册的作者和责任编辑保持良好的互动，认真审稿，精益求精地修改文本、补充资料、优化结构，本着为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对待自己的职业。凡此皆说明学术界与出版界的精诚合作对于完成科研成果转换的重要作用。

^① 这套丛书于2011年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2012年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两次申报工作，均得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任新建研究员和中国人民大学胡鸿保教授的极力推荐。

前 言

本书关注的是金沙江峡谷藏族的丧葬文化。笔者在长达 800 公里的金沙江峡谷分别选择了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简称“玉树州”）巴塘乡、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简称“甘孜州”）白玉山岩乡与西藏自治区贡觉是三岩区（这两个地方合并称为“三岩”）及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简称“迪庆州”）德钦县羊拉乡作为田野点进行为期一年的田野调查工作，通过对当地人处理尸体的方式进行“深描”，探讨隐藏在尸体处理背后的“地方性知识”。

全书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第一，金沙江峡谷的丧葬文化是如何产生的，其历时性表现是怎样的？第二，峡谷内各文化层之间的丧葬文化因子是如何结合的，结合以后形成的丧葬文化模式分别是什么样的？第三，峡谷内各个田野点的丧葬文化模式存在哪些差异，其原因何在？这三个问题呈现了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前两个问题是第三个问题的基础，第三个问题是前两个问题的结果。

在研究方法上，本书主要采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通过在田野调查中收集当地的传说与歌谣、采访宗教人士与深悉“地方性知识”的老年人，记录当地的种种丧葬仪式，辅之以人类学的整体观和比较法对以上提出的三个问题进行研究。

在研究视角上，本书梳理了自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学术界对藏族文化的研究视角，尝试以宗教信仰为主体、以生计模式和社会结构为两翼对丧葬文化模式进行建构，通过描述峡谷内的宗教信仰、生计模式与社会结构这三个变量的发展过程，建构每个田野点的丧葬文化模式。

在叙述结构上，本书围绕“死亡”与“重生”这对概念展开，从主位角度出发，将丧葬文化表达为生者出于对死者灵魂的依恋与恐惧的双重心理，在一定信仰观念的支配下，利用自然环境对死者的尸体进行特殊处理以安顿死者灵魂的行为。

关于本书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笔者指出，金沙江峡谷多种丧葬文化来自民

族迁徙的遗存，它在历时性方面表现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史前时代，来自西北氏羌族系的祖先、来自北方草原游牧族系的祖先和西藏土著族系的祖先纷纷涌入金沙江峡谷，给峡谷带来了食尸葬、野葬以及居室葬、岩洞葬和瓮棺葬。从死亡观方面看，它表明了金沙江峡谷居民的灵魂观念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又从人鬼共居到人鬼分离的步骤。第二阶段是文字时代到7世纪左右，以白狼和磨些（也称“摩些”、“么些”）为代表的西北氏羌族系、以鲜卑和蒙古为代表的北方族系和以雅隆为代表的土著继续涌入金沙江峡谷，为峡谷带来了石棺葬、土葬、火葬与树葬。这些民族皆持原始的萨满教，大多有南迁的经历，因此在死亡观方面表现了魂归北方的愿望。第三阶段是从7世纪到12世纪左右，随着吐蕃东进，峡谷内的原始萨满信仰逐渐过渡到充满等级森严观念的苯教信仰。具有等级森严观念的苯教为峡谷内的各种葬式烙上了等级的印记，使土葬演变成一种上等的葬式，而水葬则成为一种下等的葬式。在苯教信仰的支配下，这个阶段人们的死亡观都指向灵魂复活，把活生生的现实世界原封不动地投射到死亡观念当中。第四阶段是从12世纪起到现在，藏传佛教传入金沙江峡谷，使峡谷内原本受苯教支配的丧葬文化转为受以藏传佛教为主导的复合信仰的支配。一方面，藏传佛教各教派尽可能推行印度佛教倡导的火葬、水葬以及野葬（天葬）三大葬式；另一方面，各教派又根据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有选择性地对原来的葬式进行改造，峡谷内各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不尽相同，葬式的表现亦是如此。这个时段内，峡谷内的藏族群众基于复合信仰而产生的死亡观丰富多彩，各式各样。从大的方面来说，佛教所谓的六道轮回、投胎、转世等思想是峡谷内老百姓普遍的信仰，但是在投胎、转世方面，三个田野点的老百姓又表现了许多差别。

在第二个问题上，笔者认为，丧葬事实上是一种文化特质，它把自然环境、社会结构与宗教信仰等诸多要素有机结合在一起，在动态层面相互发生作用。金沙江峡谷丧葬文化的时间区分是空间区分的基础，空间区分是时间区分的结果。换言之，峡谷丧葬文化的空间区分基本上是基于时间区分的第四个阶段成长起来的：①在金沙江峡谷的入口，天葬最为流行，其他葬式仅为辅助，各葬式之间体现了森严的等级结构，其送魂仪式主要体现了人们对灵魂进入三善趣的追求——人们多在天上、人间与地下的轮回空间观念中追求降生于人间，我们暂且称之为以天葬为主的等级丧葬文化模式。②在金沙江峡谷的中端，多种葬式并行不悖，送魂仪式缤纷多彩，人们在各种宗教信仰之间对死亡进行随意解释，因此那里的藏族群众大多只接受苯教灵魂复活观念与佛教的三善趣观念，而对佛教所谓的三恶趣给予排斥，我们暂且称之为多种葬式并行不悖的复合葬文化模式。③在金沙江峡谷的出口，葬式稀少，人们可选择的葬式也相对较少，土火二次葬一枝独秀。人们在死亡观方面表现得相对豁达，最接

近印度式佛教徒的死亡观，同时带有儒家文化的色彩，我们可以称之为“含括”孝道的六道轮回土火二次葬文化模式。

至于第三个问题，笔者相信，长达800公里的金沙江峡谷在葬式方面大体呈现了“两头少、中间多”的状态。而以丧葬文化的中轴——死亡观而言，整条峡谷存在着三种丧葬文化模式，三种不同的丧葬文化模式事实上是三地复合信仰不同的表现。峡谷入口是弥漫着等级意味的天葬文化，这种丧葬文化从根本上说是佛教信仰“含括”苯教信仰造成的；峡谷中端的复合葬文化模式在宗教信仰方面表现的则是佛“含括”苯或苯“含括”佛的复合宗教信仰；峡谷出口的土火二次葬文化模式在宗教信仰上的表现是佛教信仰“含括”儒学思想的复合信仰。

金沙江峡谷的丧葬文化模式之差异可以分别从当地的地理环境、社会整合方式以及藏传佛教对其他宗教的整合手段来分析。从地理环境上看，金沙江入口地处高原，那里的藏族群众过着一种纯粹的游牧生活，其社会整合是基于地缘基础上形成的机械团结，藏传佛教噶举派“含括”苯教，因此人们的死亡观相应表现了“含括”苯教等级观的佛教轮回观；金沙江峡谷的中端三岩地处山坝，交通闭塞，口袋形的地势使当地藏族群众无法与外界进行有效互动，葬式文化易入不易出，那里的藏族群众过着半牧半农的生活，其社会整合是基于父系血缘组织——帕措而形成的离散状态，藏传佛教宁玛派组织相对涣散，采纳了许多苯教的修持，藏传佛教信仰与苯教发生交融，使三岩藏族群众的死亡观更复杂，表现出插花地式的状态；金沙江峡谷出口地处河谷，交通方便，其与茶马古道的中转站奔子栏接壤，那里的藏族群众与外文化互动频繁，藏传佛教格鲁派以佛学正统自居，为维护佛学的光辉对苯教与巫术采取压制的策略，但它在发展过程中依靠的是清王朝的武装力量，无形中也吸纳了一定的儒学思想，因此其六道轮回死亡观渗透了一种孝道。

目 录

导 论/1	
第一节 芄野东面的民族学奇观·····	1
第二节 丧葬习俗与人类学·····	4
第三节 丧葬文化模式的建构·····	13
第一章 “中间场”：流动的历史/25	
第一节 地理、生态与文明·····	25
第二节 历史、民族与人文·····	30
第三节 金沙江峡谷的丧葬文化丛·····	36
第二章 文化底层之死：从永生到复活/41	
第一节 史前丧葬文化：从人鬼同居到人鬼分离···	42
第二节 萨满时代的丧葬文化：生命永生·····	53
第三节 苯教时代的丧葬文化：生命复活·····	59
第三章 天葬文化模式：弥漫着等级色彩的轮回/69	
第一节 青海巴塘乡：一个高原牧业区·····	69
第二节 白“含括”黑：天葬文化兴起·····	75
第三节 社会结构与葬式的等级表达·····	84
第四节 由死向生：重生的等级观·····	110
第四章 复合葬文化模式：拒斥三恶趣的重生/120	
第一节 川藏三岩：一个半牧半农区·····	120
第二节 苯佛信仰与葬式分类·····	127
第三节 葬礼与葬式：红黑兼容与红黑之争·····	148
第四节 死而不死：随心所欲地再生·····	163
第五章 土火二次葬文化模式：在孝道中实现转世/171	
第一节 云南羊拉乡：一个河谷农业区·····	171

第二节	黄“含括”儒：土火二次葬文化兴起	177
第三节	死亡人群、原因与葬式分类	195
第四节	从死到生：在孝道中实现转世	212

第六章 魂归故里：实现永生的手段/225

第一节	比较：金沙江峡谷丧葬文化展示	225
第二节	区分：金沙江峡谷丧葬文化的时空演变	228
第三节	诠释：金沙江峡谷丧葬文化模式的差异	233

第七章 死亡、个体意识与社会结构/247

参考文献/258

后 记/271

<h2>附图表目录</h2>	
图 0 - 1	金沙江峡谷俯瞰 2
图 0 - 2	田野点地理位置示意 13
图 0 - 3	本研究的技术流程 18
图 0 - 4	本研究的主要内容 19
图 0 - 5	本研究的论证逻辑结构 22
图 1 - 1	金沙江峡谷内外交通要道 34
图 2 - 1	日常生活中使用的陶碗与陶罐 49
图 3 - 1	青海玉树县巴塘乡的地理位置 70
表 3 - 1	巴塘乡藏族群众年度经济生产活动安排 73
表 3 - 2	扎武部落驻地的藏传佛教寺院统计 76
图 3 - 2	巴塘乡社会阶层橄榄球状分布示意 87
图 3 - 3	瓮棺葬的位置示意 94
图 3 - 4	巴塘乡各种葬式的等级关系 110
图 3 - 5	巴塘乡丧葬文化模式 118
表 4 - 1	苯教信仰指导下的死亡与葬式分类 131
图 4 - 1	喇嘛与阿尼共同主持出殡仪式 152
图 4 - 2	萨满信仰与佛教视野下灵魂与尸骨的关系 161
图 4 - 3	三岩复合葬文化模式建构 169
图 5 - 1	云南羊拉乡的地理位置 173
表 5 - 1	羊拉乡藏族群众年度经济生产安排 176
图 5 - 2	明代磨些人在羊拉建造的城堡 181
表 5 - 2	羊拉乡藏族群众对死亡与葬式的分类 197
图 5 - 3	羊拉乡丧葬文化模式 223

图 6-1	藏文化在金沙江峡谷的传播路线（箭头所指）	228
表 6-1	金沙江峡谷各种葬式体现的核心信仰	241
图 6-2	各田野点的宗教信仰状况	242
表 6-2	形成三种丧葬文化模式的原因对比	246
图 7-1	金沙江峡谷水槽示意	248
图 7-2	金沙江峡谷横切面示意	248